

什叶派网络与中东政治^{*}

——评艾维尔·科波斯的《什叶派的 守护者：神圣权威和传统家族网络》

李福泉^{**}

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随着什叶派在中东影响的扩大，什叶派研究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现代什叶派尤其成为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学者大多以政治角度和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研究，内容包括什叶派政治发展、什叶派与政府关系以及教派冲突等方面。部分学者以地区视角考察中东教派关系，但其基本思路依然是分析伊朗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什叶派的影响。由于囿于民族国家的边界，既有的成果既不能宏观探究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动员机制，也无法深入分析什叶派乌里玛确立自身权威的途径与方法。

在此情况下，2015年瑞士女学者艾维尔·科波斯的英文专著《什叶派的守护者：神圣权威和传统家族网络》^① 堪称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什叶派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它以哈基姆（al-Hakim）和胡伊（al-Khu'i）两个中东著名的乌里玛家族为个案，对什叶派的跨国网络和什叶派乌里玛的宗教权威进行了迄今为止最深入的研究。该书由作者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2010）修改而成，共278页，除了导论和结语等内容外，正文分为三个部分，共计6章。作者曾在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联酋、叙利亚、印度、英国和美国等国家进行了多年的实地调研，并利用大量档案资料，最终完成了这部分量十足的著作。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01年以来伊朗政教关系研究”（17BZJ008）的阶段性成果。

** 李福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流动站博士后。

①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艾维尔·科波斯首先指出，对现代什叶派的研究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固有框架，采取跨国多维的宏观视角。数个世纪以来，宗教网络的持久存在是什叶派的突出特征，乌里玛正是什叶派跨国网络的主要维系力量。他们通过人员和思想的流动建立的网络，对当代全球什叶派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纳杰夫为首的什叶派圣城是这一网络的地理中心，而掌握宗教领导权的效仿源泉则是这一网络的精神中枢。艾维尔·科波斯的著作不是简单描述这一跨国网络，而是旨在破译这一网络对于什叶派乌里玛权威的意义，揭示其内在的运行机制。^① 作者经过研究后指出，关系网络、慈善活动和政治参与是什叶派乌里玛确立权威的三大途径。

一 关系网络：家族、学生与私人代表

艾维尔·科波斯对什叶派关系网络的研究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什叶派基于宗教的关系网络由乌里玛和普通穆斯林共同构成，其中在乌里玛中享有领导权威的效仿源泉（maraji al-taqlid）^② 在整个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一定程度上，什叶派网络就是以效仿源泉为领导而形成的关系圈。学者梅尔·利特万科（Meir Litvak）早已注意到个人关系对于19世纪伊拉克什叶派圣城乌里玛社会组织的关键作用^③，艾维尔·科波斯经过研究发现，进入当代社会后，以效仿源泉为首的关系网络不仅没有弱化，反而随着什叶派的移民活动大大扩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

效仿源泉的存在是什叶派组织性的重要体现。什叶派乌苏勒教法学派规定，成年穆斯林都应选择一个在世的效仿源泉，追随其教法判断，并向其缴纳宗教税。一个宗教学者获得效仿源泉的地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信仰虔诚、心智健全、合法婚生和公平正义是前提条件，但最重要的是他要接受漫长的宗教教育，取得足够的学术成就，直到其宗教权威获得

^①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p. 2.

^② 效仿源泉即大阿亚图拉，什叶派乌里玛从高到低依次为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和胡加特伊斯兰。

^③ Meir Litvak, *Shi'i Scholars of Nineteenth-century Iraq: The Ulama of Najaf and Karbal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承认。该书着力介绍的两个效仿源泉穆赫辛·哈基姆（Muhsin al-Hakim, 1889—1970）和阿布·卡西姆·胡伊（Abu al-Qasim al-Khu'i, 1899—1992）就是典型例证。作为两个家族声望最高的宗教学者，他们先后在圣城纳杰夫经学院接受了十多年的宗教教育，并从著名宗教学者那里获得了伊加扎（ijaza）。^① 他们撰写出版了多本宗教著作，包括成为效仿源泉所必需的教法书，并最终分别在1961年和1970年被公认为效仿源泉。

艾维尔·科波斯认为，在对宗教权威的激烈竞争中，效仿源泉的网络的大小和质量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② 效仿源泉的家族成员、学生和私人代表在巩固和扩大整个网络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正由于他们，形成了梅尔·利特万科所称的“什叶派国际”（Shi'i International）。^③

首先，家族是效仿源泉关系圈的首要根基。每个效仿源泉不仅依托于一个庞大的家族，还通过子女甚至孙子孙女的婚姻，把一些著名家族的成员纳入其关系圈。穆赫辛·哈基姆的10个儿子都曾在纳杰夫接受宗教教育，他们成年后各司其职，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阿布·卡西姆·胡伊有7个儿子，他们同样接受宗教教育，帮助其父亲处理各种事务。两位效仿源泉还有选择性地把女儿许配给才华出众或者著名家族的年轻人。

其次，师生关系是效仿源泉借助的另一个主要关系。在经学院，教学是宗教学者树立声望的首要渠道，每一位效仿源泉都拥有数量众多的学生。穆赫辛·哈基姆和阿布·卡西姆·胡伊长期在纳杰夫授徒讲学，其学生来自国内外各个什叶派聚居区。外地学生完成学业后，返回故乡，在传播导师宗教思想的同时，扩大了他的影响力。20世纪黎巴嫩声望最高的三位宗教学者穆萨·萨德尔、侯赛因·法德拉拉和马赫迪·沙姆斯丁都曾在纳杰夫经学院学习，都是效仿源泉穆赫辛·哈基姆的学生。^④

最后，效仿源泉的权威能跨越国界，主要依靠的是数量众多的私人代表。由于效仿源泉不可能与所有效仿他的穆斯林见面，私人代表就成为他与各地什叶派联系的中介。私人代表被授权在各地代表效仿源泉，收集宗教税，开展慈善活动。私人代表的数量和分布地域直接决定着效仿源泉的

^① 伊加扎是宗教学者颁给学生的证书，证明他具备了进行教法创制的资格。

^②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p. 50.

^③ Meir Litvak, *Shi'i Scholars of Nineteenth-century Iraq: The Ulama of Najaf and Karbala*, chapter 2.

^④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p. 30.

影响范围。穆赫辛·哈基姆的私人代表不仅活跃在伊拉克的每个城镇和乡村，还存在于伊朗、沙特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阿布·卡西姆·胡伊的私人代表分布范围更加广泛，遍及中东、南亚和欧美等所有主要的什叶派居住区。^① 通过私人代表，效仿源泉与全球各地的什叶派穆斯林产生了密切联系，使其权威显示出鲜明的国际性特征。

艾维尔·科波斯认为，依赖于家族、学生和私人代表，效仿源泉建构了一个看似松散、实际上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关系网络。效仿源泉还建立了各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组织，进而使得自己的网络向制度化方向发展。1989 年，胡伊基金会在伦敦以效仿源泉阿布·卡西姆·胡伊之名建立，这是历史上效仿源泉第一次建立基金会来处理相关事务。^② 基金会由胡伊家族领导，先后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伊拉克建立分部，成为第一个被联合国承认的跨国什叶派非政府组织。

二 慈善活动：乌里玛与受益者

宗教慈善是穆斯林慈善活动的主要形式。按照伊斯兰教扶危济困的要求，穆斯林向来高度重视慈善活动。在什叶派中，宗教学者主导下的慈善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什叶派的存续和发展，慈善具有更加独特的意义。艾维尔·科波斯把慈善活动放置在什叶派内部的关系网络中进行了深入探究。在她看来，慈善活动是什叶派乌里玛在穆斯林中树立权威的最主要方式。在什叶派中，效仿源泉拥有收取和分配天课、胡姆斯^③等宗教奉献的权利。效仿源泉的声望越高，追随者越多，他获得的宗教收入就越多。19 世纪 50 年代，当时最著名的宗教学者穆尔塔达·安萨里一个人每年从效仿者那里收到 20 万图曼（toman，古伊朗金币），而同期伊朗卡加王朝的收入每年为 300 万图曼。^④ 20 世纪以来，随着什叶派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效仿源泉掌握了巨额的资金。1992 年，大阿亚图拉阿布·卡西姆·胡伊去世时遗留下的财富高达 20 亿美元。西斯塔尼是目前世

^①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p. 54.

^②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p. 57.

^③ 胡姆斯（khums），阿拉伯文原意为 1/5，指穆斯林每年净收入的 1/5。

^④ Moojan Momen, *An Introduction to Shi'i Isl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0.

界上资金最充裕的什叶派效仿源泉之一。据估计，他在全球的资产超过 30 亿美元，而且，每年还从其效仿者那里得到 5 亿 ~ 7 亿美元。^① 由此可见，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是每个效仿源泉的共同特征。

艾维尔·科波斯的研究显示，效仿源泉利用手中的资金，从事慈善活动，以此强化了与穆斯林的联系，进而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并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宗教税。1918 年，纳杰夫大阿亚图拉塔巴塔巴伊·亚兹迪独自一人就施舍了约 10 万英镑的财物。^② 因此，效仿源泉的宗教声望和他获得的金钱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循环。宗教知识是乌里玛掌握的神圣资源，但金钱才是乌里玛和穆斯林之间关系的真正润滑剂。效仿源泉利用手中的资金，以多种形式回馈穆斯林大众，从而强化了与他们的联系，扩大了自身的影响。效仿源泉首先需要在纳杰夫等什叶派圣城的经学院内部确立地位，他不仅要向宗教学生提供食宿、校舍和图书馆，还要分发助学金。不同的效仿源泉为了树立影响，甚至竞相提高助学金的数额。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霍梅尼与阿布·卡西姆·胡伊展开竞争，使得两人给每个学生提供的助学金分别从每月 3 第纳尔增至 50 第纳尔和 5 第纳尔增至 30 第纳尔。^③

针对穆斯林大众的慈善活动是效仿源泉强化其与追随者之间关系的最有效方式。为了巩固乌里玛在什叶派中的领导地位，扩大本家族的影响，哈基姆家族和胡伊家族都高度重视慈善活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效仿源泉穆赫辛·哈基姆在伊拉克建立清真寺、图书馆、中小学和大学，70 年代以来，他的子孙延续了这一传统。马赫迪·哈基姆（穆赫辛·哈基姆的三子）在 1981 年建立了圣裔伊斯兰中心（Ahl al-Bayt Islamic Centre），为伦敦的伊拉克难民和移民提供服务。2004 年，穆赫辛·哈基姆的孙子阿马尔·哈基姆在纳杰夫创建了哈基姆基金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它不但在伊拉克开办了 500 多个教育、文化和人道主义中心，还在纽约、日内瓦和贝鲁特设有 3 个国际办公室。^④ 通过慈善活动，哈基姆家族不但提高了其在伊拉

^① Mehdi Khalaji, *The Last Marja: Sistani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Authorit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Policy Focus, No. 59, September, 2006, p. 9.

^② Hanna Batatu, “Shi'i Organization in Iraq,” in Juan R. I. Cole and Nikkie R. Keddie eds., *Shi'ism and Social Prote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0.

^③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p. 96.

^④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p. 96.

克的地位，还使其在西方国家具有了一定的声誉。

效仿源泉阿布·卡西姆·胡伊则进一步建立了全球性的慈善网络。他的慈善活动不仅广泛分布于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印度、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等什叶派传统区域，也遍及马来西亚、泰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什叶派社团存在的地方。通过慈善活动，阿布·卡西姆·胡伊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把自己的影响扩展至全球什叶派的效仿源泉。可见，慈善活动是以效仿源泉为核心的乌里玛与什叶派穆斯林大众之间的聚合剂，乌里玛提供宗教服务，穆斯林进行物质回报，效仿源泉再以慈善的形式帮助需要的人，在此过程中，双方的关系得到了强化，什叶派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三 政治参与：宗教与国家

自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参与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相比逊尼派，什叶派赋予乌里玛更多参与政治的潜力和优势，梅尔·利特万科就认为，什叶派高级乌里玛“由于他们渊博的学识、虔诚的信仰和过人的品行，被居民不约而同地默认为他们宗教的指导者以及反对统治者暴力和压迫的保护人”。^①但是在现实中，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态度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他们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政治理论。即便是同一位效仿源泉，也往往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态度。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态度往往简单地使用二分法，即区分为积极参与政治的行动主义（activism）和疏远现实政治的无为主义（quietism）。艾维尔·科波斯在考察哈基姆家族和胡伊家族的政治经历后认为，这种二分法具有误导性，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学者穆建·莫蒙（Moojan Momen）就指出，什叶派乌里玛对国家的不同立场，代表的不是不同的政治理论，而是基于不同形势的现实选择。艾维尔·科波斯进一步提出了“行动主义时刻”（moments of activism）或“参与时刻”（moments of participation）的概念，用来指“乌里玛采取旨在产生或者实际上产生政治影响的立场的时候”。^②这一方法首先关注的不是乌里玛的政治思想，

^① Meir Litvak, *Shi'i Scholars of Nineteenth-century Iraq: The Ulama of Najaf and Karbala*, p. 5.

^②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p. 120.

而是具体的政治行为。这对于认识乌里玛的政治态度和活动具有积极意义。比如阿布·卡西姆·胡伊向来被视为无为主义的典型代表，但实际上他曾几次依据形势需要采取政治行动。1991年3月，在伊拉克什叶派大起义之时，他曾发布法特瓦，授权建立九人委员会，负责管理什叶派地区的公共事务。艾维尔·科波斯甚至认为，即便是有意识地疏远政治的做法其实也在传递政治信息，比如阿布·卡西姆·胡伊在20世纪80年代保持沉默，实际上是拒绝表达他对伊拉克和伊朗政权的支持。^①因此，对于什叶派乌里玛而言，关键的问题不是是否参与政治，而是如何参与以及参与程度的问题。作为现实中的社会人，他们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有不可割舍的关系。

事实证明，什叶派乌里玛一旦选择积极参政，便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什叶派的庞大网络使得效仿源泉能够产生一呼百应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在艾维尔·科波斯看来，乌里玛的网络所在的环境制约着他们政治参与的目标、能力和手段。他们所在国家政府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乌里玛会权衡利弊，进而决定自身的政治态度。目前生活于伊拉克纳杰夫的效仿源泉西斯塔尼在萨达姆统治时期拒绝发表政治观点，但在2003年以来却频频干预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艾维尔·科波斯认为，乌里玛参与政治不仅是与政府发生关系，也同时在与穆斯林大众进行交往。身为伊斯兰教的守护者，即使乌里玛有介入政治的需求，也为这一行动提供了理由。政治活动提高了乌里玛，尤其是效仿源泉的声望，使他们成为穆斯林大众利益的代表者。由于什叶派乌里玛的广泛政治参与，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领导力量与逊尼派伊斯兰运动存在鲜明差别。20世纪中期以来，无论是阿拉伯世界还是伊朗，都积极领导什叶派伊斯兰政治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像哈桑·班纳和哈桑·图拉比那样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世俗知识分子，而是像霍梅尼、穆萨·萨德尔等一样的宗教学者。

美国伊朗裔学者迈赫迪·哈拉吉（Mehdi Khalaji）认为，在西斯塔尼之后，传统效仿源泉模式的什叶派宗教权威将会消失^②，但艾维尔·科波斯在对什叶派乌里玛的关系网络、慈善活动和政治参与逐一研究后指出，他们

^① Elvire Corboz, *Guardians of Shi'ism: Sacred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Family Networks*, p. 186.

^② Mehdi Khalaji, *The Last Marja: Sistani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Authorit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Policy Focus, No. 59, September, 2006.

并非顽固不化，而是拥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1989年胡伊基金会的成立就说明，什叶派乌里玛的宗教权威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获得更新。西斯塔尼通过向世界各地派出私人代表，使自身的权威全球化，许多乌里玛积极参与政治，使得自身的权威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艾维尔·科波斯的研究充分表明，无论时代怎样变化，乌里玛都是什叶派无可替代的守护者，他们将继续是认识中东什叶派社会的钥匙。总之，艾维尔·科波斯的著作大大深化了对中东什叶派社会的认识，开辟了现代什叶派研究的新视角，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相关领域难得一见的力作。

[责任编辑：蒋真]